

从影城出来,刚看完《修女艾达》,黑白的影像还在脑海中萦绕,淡淡的忧虑和未曾圆满的情节,把一件隔年旧事了却。和女友在面馆吃碗最朴素的拌面,附赠的蛋花豆腐羹让人感受到店家的贴心。

从打车软件上订了一辆专车,手机的定位模式清晰地显示着接单专车的行踪:他正从定西路往番禺路过来,我们还有时间再喝口茶。时间与时间的接缝处,总是能挤出一些不紧不慢的乐惠。这段时间的观影,有在风里雨里的奔走,有等不到出租车的焦虑,各种赶场,只为准时与银幕上那些故事的相约。

专车司机来自宿迁一个小村庄,他是这几天乘坐的专车中服务质量最优的司机,帮我们开门,提醒我们车上有免费矿泉水、提巾,车内洁净,宾至如归。听说我们看了电影,他长长叹息一声,都有好多年没有进过电影院了,随后牵扯出一长串关于看电影的回忆。童年的乡村,白色银幕下午两点钟就已经很醒目地撑挂在某处宽敞的晒谷场上,即使行走在很远的山路、田间,一眼就能被这片白色所吸引。于是村庄炸开了锅。最先亢奋的自然是

那些小鸟一样的孩子,他们飞奔着,叽叽喳喳地把这个讯息传播到四乡八邻,晚饭以前,周边的乡村也都知道某村放映露天电影的消息。人们早早吃过饭,拖家带口地,举着长板凳、小竹椅,从四面八方涌到晒谷场,谁先到谁就占据最佳观看位置,

露天电影

瑛子

秩序井然。在等待放映前,女人们手里做着活,男人们嗑瓜子、老人们唠家常、孩子们追打打闹,像过节一般热闹非凡。看完电影回家的路上,人们说说笑笑谈着剧情,评点着浅显的是非对错。路过某处瓜田,西瓜圆溜溜地在月光下闪动,几个调皮的小男孩就忍不住,悄悄落到队伍的最后,一个大西瓜不见了。

“现在的孩子太可怜了!”司机又是一声叹息。这个宿迁男子肯定曾是偷吃西瓜男童中的一员,不偷西瓜不看露天电影,那还有什么意思。从前的孩子,书包里瘪瘪地放着两三本课本,作业也不多,几乎在学校里就能完成,大把的时间可以用

来玩,自制沙包、小车,找些奇怪的弹头、纸片,把各种各样的玩具做出花头精。电影是露天的,乡下免费,城里几角钱一场,可以看了再看。那时影片不多,外国的以罗马尼亚、苏联、朝鲜片为主,清一色的黑白片,每部电影的主题歌大家都会唱。冰镇果露水、橘子汽水、牛奶冰砖,是看露天电影的标配。没有负担的童年,回忆中似乎除了玩还是玩,很多闲暇时光,可以用来看小人书、几个好朋友组织一场近郊游,收集电影海报和明星照片,很是放松。现在的孩子,每天除了应付作业、读补习班,估计都已经不懂得怎么玩了吧。一些小小的惊喜、小小的情趣,和一些隐藏在瞬间的小小感动,正一点点被规律和忙碌的习惯吞噬。

到家了,司机从驾驶室下来,快速奔到车门旁,帮我拉开车门:“谢谢您乘坐我的车。再见!”这个童年观看过露天电影的司机说。熟悉又陌生,心跳竟然加速,夜色如此温柔。很多年以来,我们不是本应该生活在这样的关系中吗?深深地感谢着他。

明天,让我们吃好夜饭冲个凉,去看场露天电影吧。

也许是一语成讷。陆文夫先生在62岁那年,与医生有一段对话。医生问:“你要命还是要酒?”他在愣怔片刻后回答:“我要命也要酒。”“不行,鱼和熊掌不可兼得,二者必取其一。”文夫先生与医生商量:“能否来点儿中庸之道。酒少喝点,命少要点。如果能活80岁的话,75岁就行了。那5年反正也写不了小说,不如拿来换酒喝。”医生无奈,约法三章:每天白酒不得超过一两五、黄酒不得超过三两。

先生于2005年7月9日仙逝,享年77岁。离世距今正好十周年。我想,今天我们在缅怀先生时,也许他最想听到的赞誉声,并非是他“小说大家”、“小巷文学代表”、“苏州文化名片”乃至如何“人品文品俱佳”等等。我猜想,他最想得到的一顶桂冠是“酒仙”。称他“酒仙”可算是名至实归的。他有多篇散文写到喝酒,写别人喝,也写自己喝。一写到酒,他的文字忽然就格外精神抖擞、摇曳多姿、酒味十足。我一一品读过来,终于悟出点门道来了。真正够格的“酒仙”,喝酒是无须找理由的:天气晴好要喝,天气阴冷也要喝;有朋友自远方来要喝,无人陪伴也要喝;有下酒菜要喝,无下酒菜也要喝,君子在酒不在菜也……据说,先生常常独自一人坐在茶楼上,就着一壶酒几碟小菜,欣赏着窗外的小桥流水,桃红柳绿,从中午滋滋地喝到日落西山,其饮姿之潇洒,赛过今日时尚人士品咖啡呢?

先生那些精美的佳构,是否就是在这“滋滋”声中灵光闪现出来的呢?李白斗酒诗百篇”成为酒与文学关联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据。如果先生不擅饮酒,能否写出《美食家》这样经久耐读的小说名篇呢?但有一点是肯定的,先生对酒的痴

迷,其实与他的创作心态是紧密相连的。他在文章中多次引用李白那句诗:“自古圣贤多寂寞,唯有饮者留其名。”从这里,我们就可以想见,酒杯中折射出的正是先生淡定的生活观和名利观。“醉卧文坛君莫笑,青史留名有几人?”也许这是先生最

喜欢和得意的写作心态。对于名利,先生在散文《清高与名利》有清晰的表述。先生并不完全排斥正常的名利追求,但他认为应该有一个“度”,如果超过了这个“度”,对外则破坏环境,对内则损害身心。

今天有些年轻的写作者,似乎对别的不感兴趣,只对“资本”感兴趣。我曾在一个作家榜的颁奖典礼上,听到两位当红的网络大神在台上相互抬杠,一个说:“我的最大特长就是码字速度快。”另一个说:“在我面前你才敢说你说你码字速度快?”前者立即无言以对,因为后者在圈子里创造了数年靠码字获得4个亿版税收入

的惊人纪录,曾连续7个月在网络上每天更新万字左右。对于这类作家,有位文学评论家曾用“文学资本家”来为他们定位。他们成为年轻人心目中成功的偶像。但过度追逐资本的写作者,究竟能为我们的文学经典库藏里提供一些什么东西,是有点令人疑的。因此,我觉得凡有志于从事文学写作的人,即使不能像陆先生那样成为“酒仙”,但确实需要

有先生那样一种超然于名利之上的心态。有“利欲”,但不宜“熏心”;可以“索取”,但切勿“害人”。在文学这片圣土上,如果你做不到为环保贡献力量,起码不应增加污染。

请仔细聆听,飞翔在宇宙天地间的陆文夫先生,正微笑着面对滚滚红尘,慢言细语地说:“醉卧文坛君莫笑,青史留名有几人?”

陆文夫与酒及写作心态

陈歌耕



文坛呓语

前年夏天,我们在美国买了房,推门就是草地树林,亲近自然。但从此就和各种蛇虫鼠蚁打起了交道。

搬家的第二天,我在厨房地板上看见一条细细的黑线,从后门延伸到厨房食品间。定睛一看,竟是群小蚂蚁,在排队搬运食物。估计是前房主搬家时,弄洒了些白糖,我们隔了一周搬进来,蚂蚁把厨房当成了它们的粮仓。

人虫大战记

费燕

之后,我每次吃完饭就把地拖地,还用木胶把后门门口地面和踢脚线之间的缝隙封了起来,可仍有蚂蚁出没。情况持续了两周,我正准备去买蚂蚁药,忽然它们不再来了。难道是得到了风声?幸好这只是普通蚂蚁,不是那种身长有一厘米的大黑蚂蚁。那种叫木工蚁,会蛀蚀木头。北美的房子都是木结构,最怕白蚁和木工蚁入侵。我们得定期在房子外面喷杀虫剂,防止虫害。

刚搬家时,我在地下室见识了大大小小、形形色色的蜘蛛。有细长腿的,粗短腿的,有灰的,黑的,花的,场面恐怖。它们在家里四处结网,使我极不情愿跟它们同居,最后只能实施种族灭绝政策,发动全家去抓蜘蛛。几天之内,消灭了几百只。

当时地下室还有西瓜虫,甚至出现过蚯蚓的尸体。因为地下室太潮湿,容易生虫,所以买了一台除湿器。之后,地下室就冷清了,只偶尔有几只蚰蜒钻进来唱歌。

一天,我看见窗台上有几只极细小的红色小虫,像是红蜘蛛。出门一看,房子有几处的外墙上,密密麻麻爬了无数这样的小虫,非常瘁人。红蜘蛛是有剧毒的,我赶紧上网查,才弄明白这种小虫叫赤螨,存活期短,没有危害。过了六月份便没有了。

院子里的虫更多。有一种大黄蜂,身长有四厘米,从人头顶掠过,嗡嗡作响,如同一架架小型战斗机。这种蜂学名叫螫蜂,因为它们捕食蝉。它们不群居,单独在泥地或岩石缝里挖洞做窝。大黄蜂繁殖极快,刚开始,我在后院游泳池边的空地看见几只,没当回事。只过了两周,游泳池附近就飞舞着上百只了。我们找来除虫公司的人,他们不肯在游泳池边喷毒药,怕污染池水,

只能在蜂洞里下慢性毒药。我们花了二百美元,却只见黄蜂家族开枝散叶,日益兴旺,蜂洞蔓延到了草地和后门台阶上。我们果断决定自力更生,艰苦奋斗。

大黄蜂都是傍晚回窝,我们在晚上把开水倒进洞里,烫死了一些。白天我先生就自己去打。大黄蜂生命顽强,常常得一拍打翻在地,再踏上几脚。只见某人顶着炎炎烈日,左手捕虫网,右手苍蝇拍,背水而战,一人单挑几百只大黄蜂!幸好它们不喜群殴。开始每天能打死百来只,战斗过后,尸横遍野,惨不忍睹。后来黄蜂数量逐日减少,过了两三星期,也就绝迹了。



刘蔚

小泽征尔是享誉世界的指挥大师,村上春树是一流的文学家,两人的交集是古典音乐。2009年底,小泽征尔作了食道癌切除手术,在疗养康复阶段,村上对他多次访谈,非常深入,情趣盎然。村上春树将对之整理出版为对话录——《与小泽征尔共度的午后音乐时光》。

村上春树具有深厚的古典音乐修养。比如,小泽征尔回忆卡拉扬与少女时代的穆特合作录制莫扎特、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之后,选择小泽作为穆特的下一个合作伙伴,他只说录制了“拉罗的西班牙什么什么的……”具体的曲名已记不清楚,村上马上接口:“是《西班牙交响曲》。记得我有那张唱片。”在谈论马勒时,村上从小泽1977年、1987年指挥波士顿交响乐团两次录制马勒《第一交响曲》,2000年与斋藤纪念管弦乐团合作录制“马一”,三个“马一”版本所体现的曲风变化说起,进而谈到马勒作品的复杂性于“弗洛伊德的味道”,包括自己去捷克南部马勒的故乡游览加深了对作品的理解,其知识面之广,见解之深刻

我喜欢这种安稳的喜气,俗,却温暖人心。为了写对联,父亲每年都要买一瓶上等的好墨。可父亲是那么省俭的一个人!我想起某年儿童节,为了过节看电影时能有一双凉鞋,我对着正在麦场打麦的母亲哭了一个中午。为了那双梦寐以求的凉鞋,我倔强地站在母亲面前,幻想用泪水打动她,那样家境好的同学就不会以鄙夷的目光看我。然而贫穷让

母亲心硬,贫穷让我的童年充斥着可耻的挫败感,我终究没有得到凉鞋。但父亲居然买墨汁给别人写对联。他们该付一点钱的。我一本正经地对父亲说。父亲却认为乡邻请他写对联是对他的认可与尊敬,怎么还能要别人的钱。我愤愤于父亲的这种不合理,心中只觉得父亲“迂”。

父亲“迂”的例子还很多。有段时间村里

村上春树笔下的小泽征尔

刘蔚

报酬很低,只能租住半地下室式的公寓,每天早晨起床打开窗就能从窗口看到行人的一双双脚。虽然生活艰苦,但他非常勤奋用功,当时伯恩斯坦有三个副指挥,另两个副指挥常到外面去赚外快,因此,小泽除了要熟悉自己的曲目,还要准备另两人的曲目,以随时应对伯恩斯坦的差遣,上台排演作品。机会总是降临到有心人身上。在做卡拉扬的副指挥时,他跟着卡拉扬学会了用钢琴弹奏整部的莫扎特歌剧《唐·乔万尼》,两年后,卡尔·伯姆因病无法指挥《女人心》的演出,小泽征尔受命救场,一举成功,《女人心》成了他平生指挥的第一部歌剧。

听小泽征尔讲前辈音乐家的故事,也饶有趣味。小泽征尔的长女出生后,伯恩斯坦来看望他们,他高兴地抱起孩子就往空中

抛,还说能用这种方式和孩子沟通,把小泽夫人吓得半死;奥曼迪欣赏小泽的才华,邀请他去费城管弦乐团做客席指挥,送了他一根质量很好的指挥棒,还让他自由使用自己的指挥室,小泽看到抽屉里满是同样的指挥棒,便顺手牵羊取走了三支,结果被奥曼迪的女秘书发现了,弄得他好尴尬;卡拉扬晚年与柏林爱乐产生裂痕,掌控力下降,有一次排练时那么吵闹的乐团?演奏员们发出了笑声,小泽却窘得不知如何回答是好。自然,小泽征尔对于音乐透彻骨髓的认识,更能给我们以启发。在谈到贝多芬与勃拉姆斯的区别



练马勒的《第九交响曲》,演奏员竟边排边聊天,卡拉扬批评了也无济于事,他便转过身高声问小泽:“喂,征尔,有没有见过排练时这么吵闹的乐团?”

时,他的评论言简意赅:“贝多芬的乐曲能够比较清楚地观察到管乐器与弦乐器之间的对话。勃拉姆斯则是通过融合两者来创造音色。”他还告诉我们: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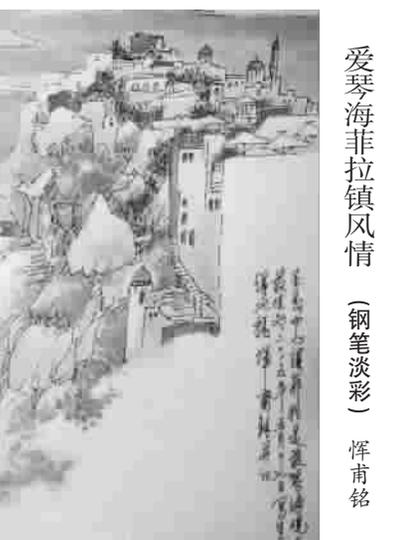
润物细无声

程琼莲

母亲心硬,贫穷让我的童年充斥着可耻的挫败感,我终究没有得到凉鞋。但父亲居然买墨汁给别人写对联。他们该付一点钱的。我一本正经地对父亲说。父亲却认为乡邻请他写对联是对他的认可与尊敬,怎么还能要别人的钱。我愤愤于父亲的这种不合理,心中只觉得父亲“迂”。

偷树成风,因为每家人口都多,便有人偷砍松树、松枝回家引火煮饭,可山上却越来越光。父亲苦口婆心劝人不要砍树,收效甚微。父亲管束着我们,不让我们偷砍哪怕小手指粗的松枝。当别的伙伴在山上打扑克,吹大牛的时候,我们兄妹几个正在汗流浹背地砍柴,临走,他们背上一大捆松枝优哉游哉地往回走,我们则背着小小的一捆柴禾灰溜溜地走在他们身后。他们还会当我们的面笑话父亲的“迂”,并为自己不劳而获沾沾自喜,洋洋得意。

母亲是菩萨心肠,那些乞丐、孤寡老人都是她施爱心的对象。一碗红薯糊,一碗面疙瘩,一件旧衣一双旧鞋,母亲总是尽自己微薄之力给他们送去慰藉,乐此不疲。然而母亲却不肯许我一双鞋。我不理解母亲,如同不理解父亲。可是多年后的我却发现,不知何时我也变成一个做事认真、坚持原则、同情弱小的人。是的,父母的言传身教“润物无声”,使我终身受益。明请读帮妈妈重新站起来的故事。



爱琴海菲拉镇风情 (钢笔淡彩) 恽甫铭

音乐家的理解力比记忆力更重要。在比较莫扎特、贝多芬作品与马勒音乐的差异时,小泽一语道破天机,莫扎特、贝多芬作品“有一个明确的形式框架。而马勒的意义就在于瓦解这种形式框架,而且是刻意瓦解”。

小泽是个十分坦诚的人。村上春树谈到音乐对他写作的启示,将文章的节奏类比音乐的节奏时,小泽坦率地回答,他不知道文章也有节奏,所以不太了解村上形容的那种感觉。村上向他请教,为什么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多少人欣赏马勒的音乐?他想了一会,然后实话实说:“这……我也猜不透。”这份知之为知之,不知为不知的实事求是,比起那些装模作样的半吊子“音乐家”,境界不知要高多少。

十日谈

我家的故事

